

机器人写稿,记者要哭晕在厕所?

□ 刘霞

最近几天,记者的微信朋友圈被一条消息刷屏:9月10日,腾讯财经采用机器人写出了第一篇稿件《8月CPI涨2%创12个月新高》,这是国内首次采用机器人写稿。腾讯介绍称,这个名为“Dreamwriter”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能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随时输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这篇文章有理有据,数据翔实,很难看出是机器写的!

对于媒体这个正面临深刻转型的行业而言,一方面是人才流失严重;一方面是现有人员对前途深感忧虑。上述消息在朋友圈扩散之后,更加重了媒体从业人员的焦虑情绪。尽管有人指出,这篇文章数据太多,可读性差,但还是有人担心,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咬金”会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机器人来袭,记者真的要哭晕在厕所?

非也。其实,机器人撰写新闻,并非业内新鲜事。据国外媒体报道,在腾讯之前,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美联社已使用机器人编辑 WordSmith 撰写财报超过一年。撰写财报单调枯燥,但要求准确和速度。所以,自2014年夏天起,美联社开始与 Automated Insights 公司合作,使用该公司的 WordSmith 平台撰写财报文章。据悉,WordSmith 平台每周可写上万篇文章,系统每秒甚至能生产2000篇文章,雅虎的足球报道也由其自动编写。除此之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路透社也都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引入了机器人,利用它们来挑选文章;核实新闻的准确性;撰写包括地震突发新闻在内的新闻等。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媒体”机器人在新闻的生产和制造过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还

是记者编辑的“小帮手”,主要工作是编撰一些相对标准化的消息、快讯、财报以及其他编辑核实工作等。而对于一些需要发挥人类想象力并需要运用分析能力进行创新的工作,按照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来看,暂时还无法做到。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可以不断思考和创新,但机器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未来机器人再发达,人的大脑、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也不可能被取代。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篇真正的新闻,“七分采,三分写”,真正优秀的新闻稿件并非记者闭门造车的结果,也不是类似财报那样的消息汇总稿件,而是记者深入一线进行实地采访,再经过细致地思考,用心提炼出的思维和智慧的结晶。而就目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来看,机器人都无法像人类那样流畅自如地与他人交流,更不用

说没有目的地进行采访了,机器人采访能力的欠缺是其从事新闻工作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然,写稿机器人还是会向某些从业人员造成威胁。真正合格而优秀的记者应该提供有价值的观点、有深度的行业调查、有智慧沉淀的对话。那种只参加发布会,记录领导讲话,然后改通稿的记者,其实早就成了新闻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了,根本不需要正牌机器人出手就应该被淘汰。

所以,机器人并不会也不可能抢走新闻工作者的“饭碗”。相反,它们从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记者,使记者不再只是别人的传声筒,不再局限于做一些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而能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的调查,撰写更有深度的文章,进一步发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功能。

平凡创新不平凡

□ 武夷山

2015年2月,英国诺丁汉大学产业经济学荣誉教授 G. M. Peter Swann (斯旺)出版了专著《平凡创新:我们是如何创造国家财富的》。该书对各类创新进行了条分缕析,而不是简单地高呼“创新万岁”,并提出了“平凡创新”的概念。

平凡创新指的是这样一些创新:不起眼的,频繁发生的,非职业化的,非惊天动地的,像野花野草那么普通的。这种创新的目的,不是增强企业的商业绩效;这种创新的结果,主要不是物质财富之增长,而是福利与幸福之类的“财富”增长。斯旺称之为“R型财富”。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 Von Hippel 教授早就论述过,创新不仅是商业世界的现象,当用户不能在市场上找到质量、价格都满意的商品时,他们也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或愉悦感而创新。另外,“社会创新”的概念也超越了严格商业意义上的创新之分析框架。斯旺在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基于两个“区分”与一个模型:一是对物质财富与R型财富的区分,一是对外部经济活动与家政经济活动(oikonomia)之区分;一个关系模型则将九类经济活动与两种财富联系起来。

斯旺认为,商业创新或企业创新有两大特征:第一,其目的是提高商业绩效,因而只对物质财富有间接影响,对R型财富的间接影响则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由于商业创新离家政经济活动很远,大部分商业创新对于企业是很重要的,但对最终消费者的意义不大。例如,若某项创新有降低成本之效,但该项创新产生的经济利润基本上被企业所吸收。斯旺发现:创新活动的性质离家政经济活动越远,这一创新的社会效益与创新者收获的经济效益之比就越低。

第二,企业创新基本上具有创造性破坏之特征,因此,创新的社会效益——创新者、其竞争对手、消费者等各方获得的正效益或负效益之总和——通常是最低的,因为被创新挤出市场或市场地位大大受损的那些人遭受的巨大损失抵消了创新带来的正效益。大部分创新经济学家都觉得创造性破坏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斯旺却花了专门一节的篇幅来讨论“企业创新的破坏性侧面”,他将创造性破坏分解为不同形态,并分析各类破坏形态对物质财富与R型财富之影响。

平凡创新则不涉及创造性破坏,因为这类创新对商业事务几乎没有影响。斯旺比喻说,平凡创新像是“一阵和煦的创造力微风”。由于平凡创新多产生于家政经济活动,故对消费者的影响较大。平凡创新产生的社会效益较高,因而这种创新的社会效益较高,能直接导致R型财富的增长。

平凡创新与社会创新是不同的。社会创新是要为满足重大社会需求而提供市场未能提供的解决方案。从受益对象来看,平凡创新与社会创新似乎不好区分,但二者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社会创新,创新的主体与消费者往往是分离的;而对于平凡创新,创新主体(无论是某个人还是一个集体)与消费者几乎是合一的。因此,这里不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我们自己来创新”这样的前提判断,因为此处本来就没有市场。

斯旺在结论部分说:“平凡创新是关于我们老百姓如何创造国家财富。企业并不具有创新或财富创造的垄断权”。因此,平凡创新不平凡!

在我国大力提倡万众创新的今天,平凡创新的概念对我们应有启示意义。

开放共享才能提高创新效率

□ 王晋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下简称科研设施与仪器)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基础条件。2014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的重要举措。

《意见》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科研设施与仪器配置、管理、服务、监督、评价的全链条管理是一个闭环,资源的配置是管理的起点,日常管理和对外服务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用最大化的关键,监督和评价是对资源利用状况的把握,评价的结果是下一轮资源配置的依据。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纳入平台管理,是实现科研设施与仪器全链条统筹管理的重要载体。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应该为管理单位开放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提供窗口,为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用户查找和获得仪器服务提供便利渠道,为管理部门监督促进管理单位开展科研设施与仪器对外服务提供得力工具,为科技、财政部门开展对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服务考核评估的决策助手。

《意见》要求强化科研设施与仪器管理单位开放服务的主体责任。科研设施与仪器管理单位一要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制度,向社会公开科研设施与仪器使用办法和使用情况,开展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服务;二要建设科研设施与仪器在线服务平台,并纳入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实时开展科研设施与仪器在线预约服务;三要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运行和开放情况的纪录,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科技、财政部门的考核和评价。

《意见》要求建立对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服务的考核评估管理机制。定期对科研设施与仪器的运行情况、管理单位开放制度的合理性、开放程度、服务质量、服务收费和开放效果进行评价考核需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对管理单位的监督管理作用,充分激励管理单位开放服务的积极性。一是要以法人单位为评估服务主体,建立分类对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服务考核的指标体系;二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定期考核的工作机制;三是对对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服务后补助和限制法人单位补充购置设备为奖惩条件,实现干好干坏不一样的考核结果。



图/CFP

专业细分靠抓阄决定?

关系到学生就业前景的专业细分,却通过抓阄的方式来决定。近日,南华大学2014级土木工程专业系采用的专业分流的方式,引发质疑和讨论。南华大学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因每个专业发展和就业前景不同,若自由选择,必定出现有的专业人满为患,有的无人问津。通过抓阄分流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靠什么走出“学而优则仕”

□ 朱四倍

施一公已正式获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但他明确表示:“自己每年在清华要教约100节课,这是雷打不动的,无论是不是副校长,我相信我的课一定不会减,只会增加。”

当上清华大学副校长之后,教学和科研怎么办?公众和科学界对施一公的关注恐怕不在于其能否担任什么样大学“官职”,而在于其科研成果和教学效果如何。更直接的问题就是施一公会不会掉进“学而优则仕”的陷阱呢?这是人们的直接忧虑所在。

一切当然都要靠事实说话。大学是学术组织,本是常识,本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官本位”正在演化成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呈上升趋势,可以说,公众对施一公担任副校长之后的关注就在于于此。

当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不少大学把“官帽”作为激励人才、挽留人才、防止人才流失的措施,导致了“学术人才官僚化”的尴尬场景,同时,由于学校行政权力的强大作用,制造了“仕而优则学”的怪象,最终造成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身份混乱,影响了公众对大学和大学的认识和判断。众所周知,过度的行政化使得高校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事务,有限的经费耗费在毫无知识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与科研价值的行政、准行政行为上。高校行政化导致教育资源是按权力格局分配,使得一些人的主要精力不是做扎实的教学和科研,而是忙于应酬、接待,也让一些教授心浮气躁,热衷名利,不能安心教学和潜心育人。

从深层次上说,当前的高校管理制度脱胎于传统体制,大学是政府的附属品和政策的延伸物,实行的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管理模式。更直接地说,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受阻,形成了有悖于学术性组织本质的官僚制霸权,从而抑制了大学的学术创造活力。山

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认为大学越来越不像学术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认为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用行政力量来干预学术,评教授、评经费,这是身处大学行政化之中个体的直接感受。对施一公来说,能否走出“学而优则仕”显然也是一种考验。

常识告诉我们,大学是一种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特殊机构,探究高深学问是大学存在的核心基础。没有学生,就无所谓大学的存在,对学生负责是大学的核心责任,也是教师的基本职责。教授作为学术权力的代表,影响力不是来自于行政权力,而是与学术修养、学术成就、学术道德等学术特征而形成的威望有关。教师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书育人,这是大学教师的本性和本职工作,更是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不教书育人,何以成为教师呢?又谈何成为教授呢?

靠什么走出“学而优则仕”的陷阱?这不仅是一公的问题,而是整个大学人都需要直面拷问的大课题。

国际交流中的本土文化“失语症”

□ 张承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下,党和政府多次指出要“加快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然而,如果不能解决中国文化当前存在的“失语症”,无疑将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

早在2000年,南京大学从丛教授就提出“中国文化失语症”概念,即英语教学过程中仅强化西方国家文化介绍,忽视中国本土文化以英语为载体的教学,使文化教育片面的成为“目标语文化教育”,作为交流一方的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处于“忽视状态”。

为缓解“中国文化失语症”,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者及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进行诸多尝试和努力,然而学习者在日常实际交流中说得清楚却讲不来中国年的文化交流“单行道”现象依然存在,并且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随着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程度进一步加深,随着民间国际交往形式和途径更加多元、便利,这种本土文化失语现象造成的交流低效性更加严重。这反映出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在其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以及教学内容的设置、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以及考察测评标准和考核形式等诸多教学环节中本土文化内容纳入考量的系统性欠缺。

文化的“平等性”在我国外语课堂中应得到更加直接和有效的体现。“文化导入”理论原本就旨在使学习者掌握和运用目标语言,使之与本国土文化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创新与互动能力,从而对人对己都有准确而清晰的了解,并能够用目标语言与他人交流分享,使学习者成为既非崇拜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也非循规蹈矩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而多元文化间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要体现便是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对本国土文化教育的有意识强调,从而平衡目标语言文化学习与相对应的本土文化信息间的关系。学习者在外语教学的接受过程中应该得到对自身本土文化的了解和梳理,这里本土文化既指本国文化,也可指地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以目标语为媒介对本土文化信息进行有效的输入和输出,这样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才能有效的辨别和判断,

能够准确和客观的传达信息,具备双向的交流能力,自信的交流态度和科学的交流技巧,从而我们的本土文化才能在日益频繁而深入的人与人之间的国际交往中得到最为直接、准确、公正和有效的表达与传递,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的“走出去”。

高校外语教学本土文化回归之路要求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既要“铺路”又要“走路”。“铺路”是指在教学中将我国文化精髓内容列入其中;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内容选取阶段针对各教学单元和内容将相对应的本土文化知识纳入知识技能体系;在课程设置环节针对专业外语课程和非专业外语语识或专门课程中均开设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关的外语课程。“走路”是指在具体教学实施阶段系统性地本土文化教学纳入课堂教学操作,从课前任务布置、课堂活动设计,到课后评估以及反馈等师生互动环节均对本土文化知识内容有所涉及和侧重,使以目标语为载体的本土文化学习与外语和外国语言学习并存于高校外语课堂,使得外语这一文化交流工具回归其“双行道”的功能实质。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曾创造无数辉煌,也曾饱受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之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我们本土文化的“声音”需要更加响亮。语言与文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两者的传承都直接体现了母体国家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我们早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渴望交流与分享。今天,一门语言课程既具备目标语言和文化内核,又应有本国特色的语素与文化信息交融其中,外语课程的设计也应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及时、全面地将我国文化以目标语为载体融入教学各环节,使我们的学习者在具备与世界沟通的能力的同时,亦具备准确、详实地表述自己文化的能力,使得跨文化交际的“双行道”彻底通车成为可能,使本土文化在国际交流中走出“失语”,实现文化平等、文明平等。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外语教学部)

当跨界思维撞上手机制造

□ 许茜

前不久,吹鸣许久的格力手机终于在某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开卖,虽然质疑声不断,但董明珠依旧底气十足,表示卖1亿部都不是问题。如今不仅是家电企业、互联网企业,就连工程机械龙头“三一重工”也跨界“玩”起了手机制造。“跨界”是大热的互联网思维模式之一,那么当跨界思维撞上了手机制造,结果还会不会很美妙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中国手机市场累积出货量为4.52亿部,比2013年的5.79亿部下降21.9%。可见目前国内手机市场增速逐步放缓,已接近饱和和状态。近年来,国内手机生产商中兴、华为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

格力、乐视等这些原本在各自领域里做得有声有色的大佬们,为何要跳进手机这片“红海”?显然,他们为的不是那点蝇头小利,而是作为终端概念的手机闭环生态。“闭环”一词是由乔布斯首先提出,如今的国产“跨界机”也是

待能够以移动终端——手机作为流量和服务的入口,在一部手机内设置自己的音乐、购物、视频、支付等功能一体的平台,从而搭建起一个封闭式的营销网络,通过手机内部的软件收取费用。

但今时不同往日。国产机大部分使用的是安卓系统(Android)。而安卓是一种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它允许任何移动终端厂商加入到Android联盟中来。显著的开放性使其拥有众多的开发者。换言之,这是一个谁都可以进来的圈子,要拼的是开发质量,搞封闭那一套显然已经过时了。

以乐视跨界造手机为例。固然,相比其他视频类网站乐视有其独有的优势。截至2011年底,乐视已经拥有国内最大的正版影视剧版权库,几乎覆盖了国内所有的影视剧网络版权,且这些版权多为独家版权。但仅依靠“人无我有”的视频节目就可以绑定用户,进而为手机买单,再将乐视应用链条复制apple store模式,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但

无论平台多么“耀眼”,硬件多么“酷炫”,内容才是用户最真实的需求。A网站没有可以去B网站,没买手机不能免费看那就付费看。对于大部分用户而言,播放器到底也只是手机的一个附属功能而已。

而传统制造业涉足手机行业,很可能是希望依托手机终端对接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医疗等,使手机成为智能操作的遥控器。然而,这样的想法需要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上,那便是手机必须一直存在。短十年前,当“苹果”在中国还是一种水果,手机还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的天下,谁也没有想到智能手机的出现,以及它带来的革命性改变。那么,下一个十年呢?是可穿戴设备?还是已经隐于意念的智能?手机是否还能够作为终端而存在呢?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曾在给员工的内部信中写道,“未来的移动互联网的中心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手机……它的中心可能是智能汽车,可能是智能手表,可能是你根本想不到的东西”。到

那时,有谁知道手机为何物?

即便在短时期内,手机依旧会是“连接一切的中心”,“跨界机”真的会好吗?如今的智能手机其实是在功能机的基础上搭载了电脑的部分功能,实现了移动互联和智能交互。自iphone4问世以来,智能手机逐渐为国人接受,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近年来,手机功能上的创新其实并不明显,只是在分辨率、像素等参数上不断优化。手机的同质化现象极为严重,各家之间的竞争主要在于价格。小米公司总裁林斌上月在参加某行业论坛时表示,手机在接下来的5年内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变化,但很难有大幅度突破。

在手机功能已日趋完善、千元智能机激烈角逐的今天,消费者是否会因为一个智能遥控功能而花费上千元买一部手机?这些“跨界机”进入是真的会给行业注入发展动力,还是说价格大战又添一把火呢?且将这所有的疑问都交给时间去回答吧。